主编/何薇 责编/王龙霄 校对/甘婷婷 美编/奚威威
电话：(010)84078838—8031 本版邮箱：wwbshoucang@163.com
2025年4月8日

此地江河浩荡——中国现代文学馆建馆40年回顾展赏析

贺同越

为庆祝中国现代文学馆建馆40年，3月26日，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的“此地江河浩荡——中国现代文学馆建馆40年回顾展”在京启幕。展览以丰富的历史文献、珍贵的馆藏文物、多样的互动形式，全方位展现中国现代文学馆自1985年建馆以来守护文学遗产、推动文学发展、创新服务大众、文物活化等方面的探索和成就。

展览的第一单元是“馆史物语”，展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一浩荡江河的起源和发展。通过陈列的历史批文、会议纪要、作家手稿及往来书信等珍贵史料，展现了众多文学前辈为中国现代文学传承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展览的第二单元是“此物最堪思”，展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一浩荡江河中的奇珍。中国现代文学馆有作家文库142座，出版社文库12座，现有馆藏品已达98.04万件，其中文物20.35万件，定为国家一、二、三级珍贵文物的有785件。在这里不仅能看到手稿、书信、实物、书籍、字画，还能听到跨越时空的作家声音。每一件藏品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捐赠背后都藏着奉献，每一次保管都是对文心的守护，每一次展览都是跨越时空的对话。

展览的第三单元是“让人敬重的文学阵地”，展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一浩荡江河在文学研究、学术交流等方面的斐然成果。其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为学界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平台；设立的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激励了新一代文学研究者的成长；推行的客座研究员制度吸引了优秀学者参与；而《青春之歌》奖学金则为文学创作注入了新鲜血液。与此同时，中国现代文学馆还积极发挥桥梁作用，通过推动中国博协文学博物馆专业委员会与全国文学馆联盟的深度合作，促进了跨区域文化交流与资源共享。

展览的第四单元是“人气活跃的文学现场”，展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一浩荡江河在关注当下文学发展、密切联系作家、青少年教育、作家诞辰纪念等方面的突出贡献。不仅展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在文学传承与创新中的桥梁作用，更传递出文学作为精神纽带，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深远意义，让观众深刻感受到中国现代文学馆不仅是文学的守护者，更是现当代文学的推广者，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展览的第五单元是“数字赋能文学的亮丽窗口”，展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一浩荡江河在数字赋能的基础上更加萌发出新的活力。本次展览不仅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以往的数字化工作，还探索了文物活化的新方式，通过L屏视频的创新展示，以全新的姿态与观众对话。数字技术为馆藏文物插上了翅膀，让文学的光芒穿越时空，照亮更多人的心灵。

此次展览，是四十年历程的深情回眸，更是对中国现代文学馆未来发展的美好展望。未来，中国现代文学馆将继续以坚定的步伐，书写崭新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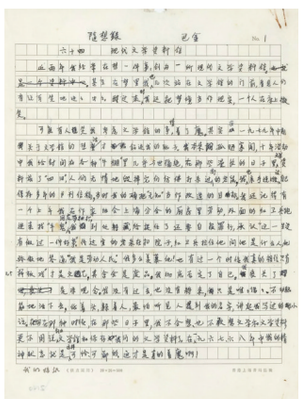


图1–1《现代文学资料馆》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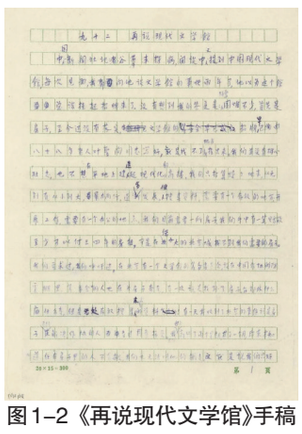


图1–2《再说现代文学馆》手稿

珍贵藏品

图8

巴金手稿《现代文学资料馆》、《再说现代文学馆》（图1）

1981年4月，在“随想录”专栏中巴金专门写了一篇《现代文学资料馆》。1982年8月17日，又写了一篇《再说现代文学馆》。这两篇文章阐明了巴金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愿景和构想，“我设想中的‘文学馆’是一个资料中心，它搜集、收藏和供应一切我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五四’以来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们有关的书刊、图片、手稿、信函、报道……等等、等等。这只是我的初步设想，将来‘文学馆’成立，需要做的工作可能更多。”这两篇手稿不仅是文学馆的重要史料，也对巴金晚年的思想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

三闲书屋出版鲁迅编印并作序《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图2）

图2

图3

本书为鲁迅编选并作序，1936年三闲书屋出版，线装本，珂罗版宣纸精印，共收德国女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版画21幅。封面题字出自鲁迅之手，书前有鲁迅自序、茅盾译史沫特莱序文，艺术性与革命性兼蓄，极其珍贵。该书共印103本，此本为第七本，为鲁迅赠予巴金，巴金一直珍藏，书中多处钤有钱君匋所刻“巴金”“李尧棠印”。巴金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鲁迅、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图3）

本书为鲁迅、郑振铎辑选合编的一部传统木刻水印笺纸集。由当时荣宝斋、淳菁阁、松华斋、静文斋、懿文斋、清秘阁、成兴斋、宝晋斋、松古斋等九家藏版选材刻就。全书共分六册，内收人物、山水、鸟兽、花果、殿阁、造像等笺纸320种。当年只印制100部，这是鲁迅、郑振铎共同签名送给巴金的，上面有编号第“九十四”，为鲁迅笔迹。巴金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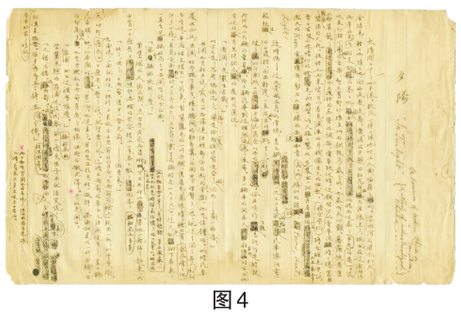


图4

茅盾《子夜》手稿（图4）

1930年，茅盾产生了“写一部白色的都市和赤色的农村的交响曲的小说的想法”，后改变为“写以城市为中心的长篇”。茅盾原取名为《夕阳》，后定名为《子夜》。茅盾的写作习惯是写好后就在稿子上修改，但十分注意页面的整洁，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钢笔书写，蝇头小楷，字迹首尾一致，保持着一种浓浓的文人气和书卷气。茅盾之子韦韬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老舍《四世同堂》手稿（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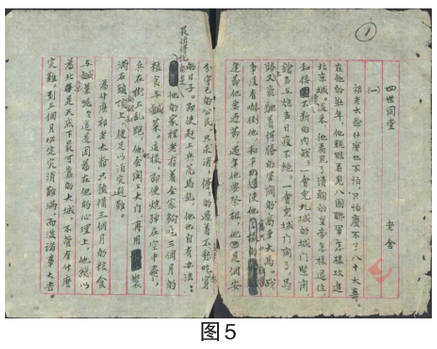


图5

手稿形成于1944年至1948年，2002年入选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第一辑。该手稿是研究老舍思想和中国新文学史的重要原始资料，墨笔恭楷竖行书于抗战时期手工纸上，仅存第一卷和第二卷，弥足珍贵。文中的修改痕迹显示了老舍对语言与情节的精益求精。老舍家属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巴金致丁玲信（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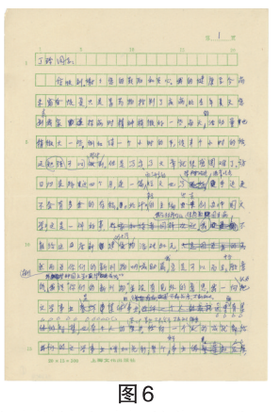


图6

1984年9月21日巴金致丁玲的信，在信中巴金恳切地说，“我常说‘做一个今天的中国作家我感到自豪’，就因为我相信这样一个集体事业。我会死亡，我的全部作品可能被读者忘记。然而我们的文学事业要前进，要大放光芒。对这个事业每个作家，每个搞文学工作的人全都有份，只要他认真工作，不管他有过或大或小的成绩。即使像我这样缺少才智的作家，我读到一部新的佳作，看到一份新的好刊物，遇到一位有才华的作者，我也觉得好像自己有了新的收获。”从这封私人的信件中，可以读到巴金对文学事业的爱，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期待。

老舍在英国录制的汉语学习教材《言语声片》（图7）

图7

1924年，老舍被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聘为标准中国官话和中国古典文学讲师。当时英国伦敦灵格风出版社曾托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出版一套针对外国人的汉语学习教材，老舍和同事布鲁斯教授、爱德华兹女士合编一套配有唱片的中文教材，名叫《言语声片》。老舍负责中文部分的编辑工作，书中的课文、生词部分的汉字全部由老舍手写，全书的课文和生词也由老舍录音。

朱自清衣箱（图8）

这只皮箱上有朱自清手书“朱自清衣箱 到北平 清华园”的毛笔手迹，隔着时光岁月，依然明晰娟秀。1937年，抗战的烽火燃遍大地，朱自清一家被迫离开清华园。他在颠沛流离中，于该年9月28日抵达青岛，将这只衣箱托运。这只衣箱随着朱自清一路南下，见证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流亡之路，是那段艰难岁月的生动写照。1997年12月24日由朱自清之子朱乔森捐赠。

唐弢书椅（图9）

图9

此椅是著名藏书家唐弢常用的书房家具，桦木椅架，骨木镶嵌椅背，总体呈西洋风格。书椅设计巧妙，它既是一把座椅，也可翻转变形成梯架。唐弢坐着这把椅子创作时，如需取高处书，便把它翻转成梯子。这把书椅曾置唐弢书房中，2000年唐弢夫人沈絜云将其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2023年文学馆对唐弢书椅进行3D等比例缩小复原，设计成“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奖杯，取“学问当坐冷板凳，研究甘作他人梯”之意，期望广大青年学者能够以书为伴，以做学问为志向，以老一辈学者为榜样，在学术研究上不断精进、勇攀高峰。

孤坐葫芦下（图10）

图10

抗战时期，李可染、阳翰笙、郭沫若等文化界人士汇聚重庆，在艰苦环境中仍保持着文人雅集的风尚。阳翰笙于自家庭院中搭建葫芦架，夏日纳凉与友品茗畅谈，成为当时文人圈中佳话。李可染以此场景入画，既是对友人生活的描绘，亦是对战时知识分子坚守精神家园的礼赞。此画为赠友人——革命剧作家阳翰笙所作，并由郭沫若题诗，“诗画合璧”，堪称文人交谊的佳作。阳翰笙一直珍藏此画。2003年，阳翰笙家属将该画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图11

蛙声十里出山泉（图11）

“蛙声十里出山泉”是齐白石好友老舍先生在1951年给他出的一道命题之作。为求此作，老舍先生当年还给齐白石老人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老舍谈到他对于此画的构想，“蝌蚪四五，随水摇曳；无蛙而蛙声可想矣。”白石老人收信后几天工夫，便以他独到的浓淡相宜的笔墨描绘出一幅远山、石涧、急流、六只摇曳蝌蚪相得益彰的画作。2013年由老舍家属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从滇文化青铜器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脉络

史强 高诗函

云南古滇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青铜艺术闻名于世。它不仅展现了古滇先民的智慧，也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脉络。昆明市博物馆举办的“古滇探幽——滇国滇人滇文化”主题展，通过展出从战国时期到西汉时期古滇国的数百件青铜器、金器、陶器、玉器等文物，系统展现了滇文化的辉煌成就，这些文物不仅是古滇先民智慧的结晶，其铸造技术、装饰纹饰和造型风格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脉络的实物见证。根据考古证实，滇国存在的时间是公元前5世纪中叶至公元1世纪初，相当于中原的战国、秦、西汉。文献没有明确记载其区域范围，从埋藏滇文化青铜文物的区域进行判断，其范围东到石林、泸西，北至昭通、会泽，南抵新平、元阳、个旧，西到安宁、禄丰，大约东西宽150公里，南北长400公里。

西汉方内曲援长胡涡纹铜戈

战国双钺形铜戈

史书典籍里的记载

云南滇池东部地区历史悠久，考古发现表明，约3万年前，人类已在今昆明市呈贡区龙潭山一带繁衍生息。滇池周边300公里范围内已发现2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等见证了新石器文化的形成。谷壳、麦穗的发现标志着人类从狩猎走向农耕文明。春秋战国时期，滇池周边出现了古滇国，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对这片区域有记载：“西自同师（今保山）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可见，“昆明”是古代云南一个少数民族的族称，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进一步解释：“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说明昆明族人口众多及其部落社会的形成。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这是我国西南边疆最早的历史记录，反映了汉代以前“夜郎、滇、昆明”等土著居民的生活状况。滇分布在滇池周围，是“靡莫之属”中最有势力的代表，他们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处于部落联盟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一记载与《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关于滇国由楚人后裔建立的记载相呼应：“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公元前3世纪（前298—277年），楚国大将庄蹻率兵入滇，与当地民族部落联盟共同建立了“滇国”，并在今晋宁区一带筑城。庄蹻将楚国和中原内地的先进文化、技术带入滇地，促进了西南与内地的文化交流。自此，云南各民族团结的史话从“庄蹻入滇”开始，融入中华民族团结发展的浩瀚长河，成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云南极具辨识度的文化符号。从“庄蹻入滇”开始，历代中央王朝纷纷将目光投向神秘的“西南夷”地区，积极开展开发与统治。设州郡县，构建完善的行政区划体系，开辟道路，畅通交流渠道，派遣官吏，强化边疆治理。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滇王归降后汉廷设立益州郡，赐滇王金印并保留其族群治理权。《史记·西南夷列传》明确记载“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云南自此融入汉王朝统治，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也不断传入云南。而1956年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的蛇纽金印“滇王之印”以考古实物实证《史记》《汉书》所载滇国史事的真实性，揭示了汉武帝“因俗而治”的边疆治理逻辑，将滇人社会纳入“大一统”政治框架，同时保留其文化自主性，为后世“羁縻制度”奠定了实践范本。

展厅里的文物印证

昆明市博物馆的“古滇探幽——滇国滇人滇文化”主题展览，以近400件珍贵文物为核心，系统展现了古滇文明的独特魅力。展览以青铜器为主体，辅以金器、漆器、玉器等多元材质文物，繁多的青铜器种类，涵盖了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贮贝器、乐器和装饰品等。兵器如戈、矛、钺、剑、叉、斧、弩机、箭镞、头盔、甲胄等，生产工具如锄、铲、镰、凿等，生活用具如壶、釜、洗、尊等，乐器如铜鼓等，以及悬挂在人身上的各种扣饰，集中呈现了古代滇人的生活风貌、宗教信仰、艺术成就和社会结构，勾勒出滇文化的多元面貌。这些文物不仅印证了《史记》《汉书》中关于滇国的记载，更为研究滇池地区古代民族史、冶炼技术和宗教习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交融、交往、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展厅文物首先印证滇国历史存在。1956年，考古学家孙太初在晋宁石寨山6号墓中发现的“滇王之印”金印，是滇国历史存在的最直接证据。这枚金印与《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汉武帝赐滇王金印的记载相吻合，证实了滇国在公元前109年已被纳入汉朝版图。此外，石寨山、李家山、天子庙等墓地的发掘，出土了大量青铜器、金器、玉器等文物，进一步证实了滇国的历史存在。其次文物印证当时的社会结构与经济活动。展厅中的贮贝器、铜鼓、扣饰等文物，反映了古滇国的社会结构与经济活动。贮贝器作为财富的象征，常见于贵族墓葬，其上的装饰图案如牛、羽人竞渡等，展示了滇国的农业、畜牧业和渔业经济。铜鼓从生活炊具演变为礼器，反映了滇国社会从物质生产到精神文化的发展。再次是文物印证了宗教信仰与艺术成就。如杀牛祭柱铜扣饰、巫师纹铜鼎等文物，揭示了滇国的宗教信仰。这些文物上的图案和造型，如蛇、牛、鸟等动物形象，以及太阳纹、翔鹭纹等，反映了滇人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同时，滇国的青铜器在造型、装饰和铸造技术上具有独特的地方风格，如失蜡法铸造、鎏金、镶嵌等工艺，展示了滇国高超的艺术成就。通过展览中的陶器、青铜器等文物，展示了滇池区域春秋中期至西汉时期两大不同族群的文化融合。百濮族群的稻作文化与氐羌族群的半耕半牧文化，通过陶釜、铜鼓、铜剑等器物的风格变化，反映了滇文化的复合型特征。这种文化融合，不仅体现在物质文化上，也反映在宗教信仰、社会结构等方面。进而以文物实物印证文化融合与族群变迁。

展厅文物构建的多维证据体系，不仅实证了滇国的历史存在，更通过器物组合、技术特征、图像系统的交叉验证，揭示了滇文化“百濮筑基，氐羌融汇”的文明生成机制。从铜鼓到贮贝器的文化重构，到鎏金扣饰的技艺创新，文物的遗存展现的不仅是古代滇人的生存智慧，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在西南边疆的生动诠释。

西汉蛙形錾铜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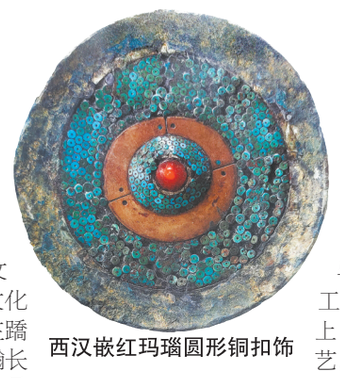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明交融发展的见证

滇池地区青铜文化始于商代晚期，鼎盛于战国至西汉，其铸造工艺既保留地域特色，又融合中原及周边技术传统，成为多元文化交融的典范。滇国青铜器以独特造型与纹饰，见证中原文明与边疆文化的深度互动，揭示华夏文明“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演进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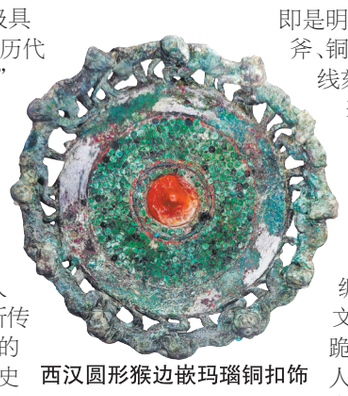
兵器领域最能体现文化交融的复杂性。战国“双钺形铜戈”融合中原青铜戈的勾啄功能与钺的礼器象征，錾、援处太阳纹、涡纹虽脱胎于商周纹饰体系，却被赋予滇人对光明与丰产的祈求。西汉“方内曲援长胡涡纹铜戈”沿用中原兵器规范，但援与内连接处的三角形突起与菱形网纹，将实用兵器转化为沟通人神的媒介。这种“形制承中原，符号创新意”的创造性转化，展现出边疆族群对中原文明的智慧重构。

战国三兽饰太阳纹长横錾狭腰铜斧

礼器系统彰显更深层的文化整合。西汉“四耳圈足太阳纹铜鼓”鼓面中央的太阳纹与中原“天圆地方”宇宙观形成跨时空对话，麦穗纹耳饰暗示农业祭祀的跨区域共性。“战国五牛盖铜贮贝器”以五牛环绕中心柱的布局，将实用容器升华为财富与神权的象征，柱顶高耸造型隐喻通天柱，体现自然与超自然的融合想象。滇国工匠在吸收中原范铸法基础上，发展出立体失蜡铸造工艺，“五牛贮贝器”上立牛雕塑即是明证；战国西汉时期铜啄、铜斧、铜戈的兽形浮雕既延续中原线刻传统，又融入东南亚立体表现技法。西汉设益州郡后，菱形纹、回纹等汉文化元素显著增加。“西汉嵌红玛瑙圆形铜扣饰”以东南亚红玛瑙为核心，采用中原镶嵌工艺，依托南方丝绸之路贸易网络，实现物质文化的跨地域整合。“执伞铜跪俑”手持垂铃伞盖，伞柄饰人面纹，既模仿中原仪仗制度，服饰又融合滇人、百越、氐羌等族群特色，成为族群共处的具象化表达。青铜器上虎、牛、鸟等动物形象，既是自然崇拜的体现，也是族群标识的象征。滇文化通过造型、纹饰与功能的创造性转化，既保留西南边疆地域符号，又融入中原、草原、南亚等多元元素，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早期视觉呈现。



西汉嵌红玛瑙圆形铜扣饰



西汉圆形猴边嵌玛瑙铜扣饰

从双钺形铜戈的礼器化转向，到执伞铜跪俑的仪礼杂糅，从铸造技术的多元融合，到生产生活的共生互鉴，再到符号表达的视觉叙事，滇人以智慧丰富了多元一体文化基因，印证了滇文化在与中原及周边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发展，最终融入中华文明的宏大谱系，证实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明交融发展历史脉络。

（第一作者为西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云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第二作者为昆明市博物馆研究馆员。**本文为2024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云南省基于博物馆开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政课’的实践路径研究”<ZX2024YB24>阶段性成果）**

西汉执伞铜跪俑

战国五牛盖铜贮贝器